



纪念上海改革开放30周年丛书

主编·王荣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上海的探索与实践

童世骏 方松华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纪念上海改革开放30周年丛书

主编·王荣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上海的探索与实践

童世骏 方松华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海的探索与实践/童世骏、方松华等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0745 - 326 - 0

I. 中… II. ①童…②方… I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理论研究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417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海的探索与实践

丛书主编：王荣华

作 者：童世骏 方松华等

责任编辑：陈 军

特约编辑：刘益民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8

插 页：2

字 数：323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326 - 0/D · 061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王荣华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已走过了整整 30 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历程。30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积极发挥国家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排头兵的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

正是得益于政策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上海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截至 2007 年底,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达到 12 001.16 亿元,经济连续第 16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人均生产总值(GDP)按当年的年均汇率折合,已达 8 594 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目前,全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水平正处于进一步发展之中。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上海城市功能不断转型升级、综合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动力。

综观上海 30 年的发展历程,其改革开放取得了以下几个值得总结的经验:首先,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寻求城市发展的突破与创新。30 年来,上海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努力建设“四个中心”,实现“四个率先”,制定了一批重要的发展战略,如“科教兴市”、“城市综合竞争力”、“城市国际竞争力”等,不断引领城市发展迈向新的阶段。其次,在注重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主动地推动政治体制和法制改革,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上海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土地制度、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等经济制度改革的同时,对行政审批制度、城市管理体制、地方大部制等政治领域进行适时改革,加快地方立法工作,全面塑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同步推动政治文明进程。再次,以保障民生利益和促进社会稳定为核心,将社会建设作为内生动力之一,加大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事业改革,谋求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上海 3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实际上就是上海人口不断多元化、社会结构分层化、社会利益复杂化的动态过程,如何有效保障民生利益,维护好社会稳定,始终是上海政府在谋求城市发展中高度关注

的问题。尤其突出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基本民生利益保障,建立健全包括外来流动人口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成果;培育各类社区组织和民间组织,疏通民众利益的表达渠道,最大程度地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以谋求经济增长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协同转型。最后,注重文化体制改革,培育更具活力和包容的城市文化精神。文化是城市灵魂,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软实力。30年间,上海文化发展依次经历了重视文化—制订文化发展战略—全面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努力把上海建成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努力建设文化大都市的发展脉络,塑造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值此上海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资深专家研究上海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历史经验,撰写出“纪念上海改革开放30周年丛书”(五本)。该套丛书深入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上海30年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领域取得的历史经验,并从不同侧面研究上海努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新思路和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海的探索与实践》一书,通过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上海的实践,分析了上海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贡献;分别对党组织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领域的探索和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对价值观、人性论、当代帝国主义、新权威主义、人文精神、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哲学、资本哲学等争鸣性问题进行了辨析和新的阐释。《上海经济改革与城市发展：实践与经验》一书,以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为重要背景,回顾和总结30年来上海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历程,概括30年来上海经济发展道路的突出特点,探寻符合上海特点的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总结上海发展经验,分析上海未来发展的背景环境与趋势,为推动上海新一轮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上海社会发展与变迁：实践与经验》一书,主要对上海人口结构、家庭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民间组织、社区建设、市民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战略。《上海法治建设与政治文明：实践与经验》一书,则主要对上海地方立法和法治建设进程以及政治文明进行了重要分析,并通过对30年来相关立法进行评估和总结,目的在于进一步推进上海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上海文化发展与变迁：实践与经验》一书,结合上海开埠前、开埠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四个发展时期,对上海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教育发展、出版业、广播影视、图书档案、体育、旅游、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相关公共政策体系。

实践证明,30年来中国和上海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和显著变化,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伟大而正确的领导,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

引,得益于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的发展能量。上海的成功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推动上海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条件,是上海实现新一轮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上海30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发展的30年,是不断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获得巨大成就和进步的30年,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上海成功实践和发展的30年。上海的经验必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毫无疑问,上海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加快“四个率先”,加快“四个中心”建设,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战略任务,不仅对上海自身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为上海服务长江三角洲、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和全面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此同时,影响上海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各国各地区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上海作为沿海改革开放地区和特大型经济中心城市,直接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的挑战。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上海的发展才能够进入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海的发展必将迎来又一个光辉的明天。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是为序。

序 言

理论工作是 30 年改革开放的重要环节

像中国社会其他各个方面一样,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工作在 30 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到“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主张,从“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主张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以物质文明为主的“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党的指导思想的这些重要变化是党的理论工作的宝贵成果。回顾总结这些变化和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理论的重要性的认识。具体些说,在 30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对理论为什么重要、理论如何才能重要和理论怎样显示它的重要,有更加清楚而深刻的认识。

关于理论为什么重要,一个明显的回答是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人会说,这只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革命的运动也就没有革命的理论。确实,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运动之间,常常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先后次序。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实践之间,也可以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先后次序。邓小平和陈云经常讲的“摸着石头过河”,讲的就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这种相互交错、彼此互动的过程。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交错和互动,意味着我们不能以为先要有一个完整的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去推动和指导实践。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根本否定理论工作在改革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高度重视理论工作的。1975 年 1 月,邓小平刚刚被任命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就着手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理论工作机构,与“四人帮”进行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四人帮”打倒以后,邓小平又积极支持思想理论领域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尤其是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真理标准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实践,但这场讨论本身是理论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本身是一个理论命题。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

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辩护；正是这种理论指导和理论辩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正当性基础。在现代社会，一个集体行动要具有正当性，既要求行动者有理性自觉，又要求行动者有意志自由。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是强调理性自觉为意志自由提供依据，强调通过启发民众在认识“理”的“不得不然”的基础上，从“自觉”走向“自愿”。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中，理论工作具有极高的地位，同时也负有极大的责任。在这样一种特定语境中，理论工作既要像学术研究那样条分缕析，也要像政治工作那样审时度势。30年来党的指导思想的演进所采取的“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相统一的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特殊责任和所具备的高超智慧的生动体现：在每一个新的实践阶段上，党都要根据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认识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充实和更新，而这种充实和更新的形式是对前一阶段的指导思想进行重新诠释、根据前一阶段的指导思想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其字面意思来突出新的重点、引入新的理念。这样的方式既体现了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过程中的思想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体现了我们党对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和思想领域的主导者这双重角色的关系的处理有一个探索和调整的过程，也体现了我们党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有一个耐心细致的说服和引导过程。

关于理论如何才能重要，一个明显的回答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对这个观点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把握了这个观点的全部内涵。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真正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很重要的一条是处理好理论思辨与通常常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晚年思想之所以严重脱离实际，不仅是因为他错误判断了中国和世界的客观形势，而且是因为他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健全常识，偏离了人民群众对什么是正常生活和幸福生活的日常理解，违背了人民群众对正常生活和幸福生活的合理追求。“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很大程度上就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极度偏离常识；而“文革”结束以后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让理论回归健全常识，比方说为正当的物质利益和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名。邓小平理论的巨大魅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在这里。从70年代末强调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到1992年视察南方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都把健全常识作为他的重要依据，批评有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江泽民曾经把邓小平的高贵品质概括为“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这两个尊重的结合，就体现为邓小平对蕴含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健全常识的尊重。当然，尊重常识并不等于盲从常识，始于常识并不等于止于常识。比方说，常识能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罪过”，但常识不足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光荣。所以，

在《邓小平文选》中可以找到“致富不是罪过”的论断,却找不到“致富光荣”的说法,因为从“致富不是罪过”确实得不出“致富光荣”的结论。又比如,常识能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但不足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在《邓小平文选》中可以找到“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却找不到“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说法,因为从“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确实不能得出“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结论。要确切回答什么是“光荣”、什么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乃至“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要确切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和国际环境问题如何解决,需要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有深刻的认识。常识不仅需要尊重,而且需要提炼和提升。只有这样,理论才真正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

关于理论怎样才显示其为重要,同样有一个明显的回答,那就是让实践来检验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仍然有进一步阐发的余地。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还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说,要让以后的实践来检验那次全会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十年内乱的“实践”清楚地表明,那次全会的决定完全是错误的,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并没有真正重视实践标准,并没有真的让实践来检验他晚年思想的正确与否。但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哲学上来说,任何实践检验都必须包括对实践结果的诠释;只有经过了诠释之后,一个实践的结果才能用来检验导致这个实践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考虑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的看法可以会有所不同。我们说的“十年内乱”,毛泽东的说法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经过这种“诠释”的“文革”实践结果,当然就“证明”了导致它的那个理论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来看,30年前的实践标准讨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在于它提出了实践标准的运用方式和实践结果的诠释方式的问题,提出了用“群言堂”代替“一言堂”、用思想解放代替个人迷信的要求。3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不仅重视用改革实践的成败得失来检验改革理论的是非对错,而且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等各方面的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也就是说,使改革实践的成败得失本身有可能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研究而获得合理的认识和评价。只有在这种合理认识和评价的基础上,导致这种改革实践的思想认识的正确与否才可能得到实践检验,理论的重要性才真正得到显现。

理论工作是全国范围内 30 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面,也是上海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央确定的思想路线、理论体系和发展战略,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的产物,同时也是理论领域的工作指导和学习宣传研究的对象。在过去的 30 年间,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专门从事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研究的理论工作者,立足上海,放眼全球,积极参与全国范围的重大理论问题讨论,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认真总结上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贯彻落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宝贵的成果。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进行的上海 30 年改革开放的回顾总结的一个方面,本书对上海理论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作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讨论。30 年光阴似箭,今与昨恍若隔世。飞速的发展为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探索和反思创造了工作条件,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履行使命提出了工作任务。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能力等几方面的因素,我们的梳理和讨论一定有一些疏漏和不足,敬请学界同仁和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总 序 / 王荣华 / 1

序 言 / 1

第一章 理论领域重要讨论 / 1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创时期：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1

第二节 改革开放攻坚阶段：邓小平理论 / 8

第三节 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16

第四节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 24

第二章 理论业绩略览 / 35

第一节 上海作者在全国性大报大刊上发表的文章 / 35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立项课题 / 52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获奖成果 / 64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的平台建设 / 69

第三章 经济建设方面的思考与探索 / 75

第一节 经济发展状况 / 75

第二节 投资与消费 / 80

- 第三节 国有企业与国资体制改革 / 85
- 第四节 浦东改革开放 / 87
- 第五节 民营经济发展 / 88
- 第六节 城乡二元结构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郊区 / 90
- 第七节 教育与科学技术 / 92
- 第八节 对外开放 / 94
- 第九节 改善民生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96
- 第十节 上海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对策 / 98

第四章 政治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 100

- 第一节 中央与上海的关系 / 101
- 第二节 科学决策体制的探索与创新 / 103
- 第三节 转变政府职能 优化政府治理 / 105
- 第四节 特大型城市行政管理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 113
- 第五节 浦东新区的治理模式与探索 / 116
- 第六节 人大的制度建设 / 120
- 第七节 基层民主发育的社会基础 / 122

第五章 文化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 127

- 第一节 上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127
- 第二节 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134
- 第三节 上海的文化产业发展 / 143

第六章 社会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 153

- 第一节 上海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 153
- 第二节 上海劳动就业体制的改革与探索 / 159

第三节 上海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 164

第四节 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 173

第七章 党的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 177

第一节 理论创新：兴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 / 177

第二节 领导方式：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 180

第三节 机关党建：以课题调研方式的党委中心组学习 / 182

第四节 社区党建：“凝聚力工程”、“高兴放心工程” / 184

第五节 国企党建：企业干部方向性“交叉任职” / 186

第六节 干部内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领导干部 / 189

第七节 民企党建：从“猪尾巴”到企业“白骨精” / 191

第八节 基层党建：“支部建在楼上”与党员服务中心 / 194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研究 / 19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见解 / 19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视域 / 209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探索 / 218

第九章 有关理论问题的学术争鸣 / 229

第一节 关于价值观和价值论的讨论 / 229

第二节 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 / 234

第三节 关于俄国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讨论 / 237

第四节 关于当代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 / 239

第五节 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 / 242

第六节 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 243

第七节 关于“第三条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 / 245



第八节 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以及经济伦理的讨论 / 247

第九节 关于经济哲学和资本哲学的讨论 / 250

附 录：上海学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 255

后 记 / 275

第一章 理论领域重要讨论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一个在 30 年前经济濒临崩溃的大国的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我们见证了一个世代人的努力、奋斗与创造,完成了几个世代人的理想、希望与梦想;而成就这当代中国 30 年伟业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与探索。

30 年来,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理论界围绕中国发展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上海地区的发展乃至党和国家的全局性工作作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显然,这些理论讨论主题的凸显及其具体的开展方向,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依据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我们把 30 年来上海理论界进行的重大理论问题讨论分为四个时期来叙述:改革开放初创时期(1978—1984);改革开放攻坚阶段(1984—1992);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阶段(1992—2002);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2002—2008)。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创时期: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正式启动的标志。就其作为改革开放的奠基石而言,关键在于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亦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果断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过,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实现“拨乱反正”的任务并非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同时,对于如何具体地开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以依循。因

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创时期,理论界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紧密结合起来,完成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上海理论界关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讨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具体展开的。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上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实践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海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到学术研究上逐渐深入的发展过程。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于1978年6月底召开了一次有少数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8月份又请周抗传达了北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的情况,并在各基层单位作报告20多次,直接听众达一万余人。不过,直到9月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举办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报告会,以及9月16日《文汇报》发表蒋文杰以笔名“虞丹”撰写的文章《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上海理论界和新闻媒体才真正打破了“不讨论、不发表、不登文章”的观望态度。9月22日、28日,10月11日,上海社联连续三次邀集上海市理论界举行座谈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充分肯定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大和深远意义:认为这个讨论,“不仅是理论上拨乱反正,而是关系到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关系到新长征的前途问题”,“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恢复《实践论》的权威,绝不是什么‘砍旗’”,并且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根本观点”是顺利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对待“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健康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前提。^①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集中刊发了一批响应这一讨论的文章^②,于1978年下半年复刊的第一期《复旦学报》(社科版)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③也分别刊登了一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学术论文。

与全国各地的情况相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理论界关于“实践与真

① 参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办公室编:《社联通讯》1978年第1期,第1—5页。

② 除了虞丹的《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外,还包括邱少全的《实践高于理论:兼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日报》1978年9月21日),钟仑的《坚持实践标准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文汇报》1978年10月5日),以及夏禹龙的《真理标准与解放思想》(《文汇报》1978年10月9日)等。

③ “文革”期间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合并组建上海师范大学。

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讨论重在明确方向、表明态度，同时提出问题，在此之后的讨论则重在巩固和扩大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积极成果，并在学术上深化这一主题。不过，其间还经历了一段小小的插曲，那便是1979年初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理论界一些人认为是“要纠偏了，是发扬民主过多了，解放思想过头了”。1979年6月29日，上海社联召开了“关于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市委书记、市社联主席夏征农和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的中心内容是强调三中全会精神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在一致性，强调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和继续解放思想的必要性，旗帜鲜明地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尤其是在基层“补好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①自此以后，上海理论界关于“实践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式转入以思想宣传和学术研究为主的阶段。

从学理上讲，上海理论界关于“实践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术探讨是内容丰富和相当深入的。讨论中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手段或过程；如何在坚持实践检验标准的同时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客观性的真理是否具有阶级性；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会导致削弱乃至否定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实践是否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的同时，能否承认真理或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以及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意味着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实践如何检验真理，实践本身又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等。^②可以说，当时全国理论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上海理论界都有所涉及，相关重点问题都有充分的讨论和争鸣。

要而言之，上海理论界关于“实践与真理标准”讨论中的鲜明特点是：始终强调“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从而始终保持“真理标准”讨论本身具有的思想解放的力度，任何可能削弱或淡化这种思想解放力量的观点（即使在学理上

① 参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办公室编：《社联通讯》1979年第5期，第1—4、49页。

② 具有代表性的或引发争论的学术论文请参看：周谷城：《逻辑推不出真理》（《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林永民：《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胡曲园：《论真理没有阶级性》（《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和《再论真理没有阶级性》（《学术月刊》1979年第10期）；金顺尧：《实践标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李成蹊：《论坚持客观真理——也谈真理没有阶级性》（《复旦学报》1979年第1期）；陈章亮：《为什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学术月刊》1980年第9期）；余源培：《要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和《真理研究中应当重视的两个理论问题》（《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则鸣：《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和《再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周积泉：《实践的目的在于利益》（《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等。